

# 评 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 ——以华工出国及华侨保护问题为视角

刘 华

(暨南大学 社科部,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蒲安臣条约; 华工出国; 华侨保护; 侨政转变

[摘 要] 19 世纪中叶,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黑奴贸易的被禁, 西方列强将其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目光转到了亚洲。两次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出国佣工形成高潮。签订于 1868 年的中美《蒲安臣条约》进一步促进了华工出国之步伐, 同时也将西方社会保护本国侨民的理念融入其间, 对清政府侨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中图分类号] D63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3)01-0047-07

## An appraisal of 1868 Sino-American Anson Burlingame Trea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workers going abroad and the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LIU Hu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Anson Burlingame Treaty; Chinese workers going abroad;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attitude towards nationals living abroad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 trade, west countries began their search of cheap labor force in Asia.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came the peak of Chinese workers going abroad. Sino-American Treaty signed in 1868 (e.g. Anson Burlingame Treaty) quickened the pace of it. At the same time, it brought about to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western idea of protecting their nationals living abroad, thus facilit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华侨保护问题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强制打开国门, 渐次融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后产生的。本文拟以签订于 1868 年的中美《蒲安臣条约》为切入点, 来述评近代中国华侨之保护问题。

### 一 《蒲安臣条约》是华工大规模出国, 华侨保护问题 提上清政府议事日程的产物

1492 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拉开殖民主义时代的序幕。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先后在美洲

[收稿日期] 2002-09-25

[作者简介] 刘 华, 女, 湖南郴州人, 暨南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和中国政府侨务政策。

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规模移民。为了开发新大陆，欧洲殖民者开始在非洲大量捕掠黑人到美洲做奴隶。<sup>[1]</sup>欧洲人和非洲人移民美洲，持续时间达 300 多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兴起的、史无前例的移民大潮。

欧洲资本家将黑人不当人看的非人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黑人的强烈反抗斗争。与此同时，也引起欧洲的有识之士、自由派人士的反感及对黑人的同情。随着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完成，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所倡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严重践踏人权的黑奴贸易和黑奴制度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和美洲白人自由派人士的强烈谴责，他们掀起了要求禁买黑奴、废除黑奴制度的立法运动。于是，“西方的良心不能容忍黑奴制。19 世纪 30 年代初，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思潮就已促使强大的大英帝国在其领土上废除了奴隶制，并带头反对不论何地存在着的奴隶制。在美国，是通过流血的战争废除奴隶制的。……巴西以逐步的和平的方式给予了被其奴役的黑人以自由。”<sup>[2]</sup>19 世纪中叶，灭绝人性的黑奴贸易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了。

从非洲自由贩卖黑人到美洲殖民地的海盜行为被禁止了。但资本主义工商业仍在飞速发展，英法等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南方的大片种植园及西部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进入了欧洲殖民主义者视域中。

鸦片战争前，小规模、小数量地诱招中国人出洋佣工的活动已经发生。

1840 年、1856 年，西方世界第一强，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强的英国人连续发动了两次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的一大重要战果，就是达到了招徕中国众多的劳动力，以满足黑奴贸易被禁后英国辽阔的殖民地对劳动力极大需求之目的。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九款规定：“凡系中国人，前往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侯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滕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sup>[3]</sup>此款规定，虽还未涉及到招工出洋之事，但却已为英国人雇佣中国人打开了第一道门。因为，它已准许英国人雇佣中国人，准许中国人“跟随及俟侯英国官人”，准许中国人“前往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从此以后，英国人及其他西方人在中国招募中国人渐次胆大。

1860 年中英北京条约第 5 款规定：“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处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sup>[4]</sup>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与上引中英条约第五款内容一致。正式在中外双边条约中订立准许华工自由出国承工之内容。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条约中关于在华招工的条款犹如开闸泄洪般，令华工出国的洪流势不可挡。

据陈泽宪先生《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一文估计：19 世纪上半叶出国华工约为 32 万人，按年平均则为 6400 人。而从 1850 年到 1875 年这 25 年间，出国华工人数猛增到 128 万人，按年平均为 51200 人，比上半叶的年平均增长 8 倍。<sup>[5]</sup>华工出国在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高潮及其资本主义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华工的大规模出国令清政府开始接触到国际社会的侨民保护问题。

中法天津条约第一款：“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毋论何人在何地方，均永远和好，友谊敦笃。彼此侨居，皆获得保护身家。”<sup>[6]</sup>此条将对等的两国国民的侨居权相互给予，并强调两国都有保护彼此侨民之义务。

1866 年中国与英法就华工出国问题签订详细条约《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共计 22 款，内含若干保护华工的内容，具体并重要的有如下几条。第 8 款：“华民承工出洋，或系独身一人，或系携同家眷，所立合同字样必须逐款开载。”第 9 款：“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逾于五年，期满如欲回国，彼处必将合同所注之水脚路费若干，按数备全交付，便船送回中华。……设若华工到彼

处后，患病不能作工，该处不俟限满，先行按数给钱送回，否则准其赴官禀请申诉。”第10款：“承工工作日期时候，定准七日之内必得休息一日，一日之内作工不过四时六刻（即外国九点钟零二刻也）。”第14款：“华工未去之先，该商如有预支银钱，皆应以为承招赏需之用，不准返还。”第22款：“华工出洋到彼，夫妇不能分派两处工作，幼儿不满15岁者，不准令离父母。”<sup>[7]</sup>

从上引条约之内容，尤其是英法与中国签订的《续定招工章程条约》来看，华工出国受到相当程度的国家保护。这便是通行西方国家的国际惯例之一：侨居国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必须给予侨居本国的他国人民生命权、财产权之国家保护；侨民本国根据双边条约对侨居他国的本国人民在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可以行使外交保护。正因此约特别强调对华工的保护，以至遭到西方资本家们的反对，最后未能换约生效。

1866年的招工章程条约未能生效，但却孕育并催生了一个新的涉侨条约：中美《蒲安臣条约》。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61年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驻中国第一任公使，承担着林肯总统寄望于他的前往中国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之重任来到中国。蒲安臣采华后，国务卿西华德指令蒲安臣：为了获得与英法在华的同样特权，美国须追随英法，加强与他们的合作。但蒲安臣认为，仅仅与西方合作还不够，还必须与中国合作。

在蒲安臣的积极倡导下，他提出的与中国的“合作政策”得到英法俄公使们的认可。其要点有：1. 除享受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外，不要求任何有损中国主权领土的特权；2. 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3. 共同保护条约权益不受任何人（包括太平天国）的侵害；4. 给予清政府以道义支持和军事指导；5. 帮助清政府组织一支西式军队；6. 帮助清政府保护其税收来源免受海盗的侵扰；7. 支持现由英人李泰国主持的中国海关机构；8. 体谅总理衙门大臣办理外交的难处，他们经常遇事推委实乃守旧派的阴谋破坏之故。这就是蒲安臣合作政策主要内容的最初表述。<sup>[8]</sup>这一政策以“外交代替武力”为主旨，强调列强在中国问题上协商合作，一致行动；强调在清廷履行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列强应扶植和联合清政府。它的实行，不仅协调和密切了列强之间的关系，而且改善和加强了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蒲安臣本人也获得了中国政府，尤其是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大臣的极端信任。奕訢称赞他“处事平和，能识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sup>[9]</sup>

1867年，总理衙门因《天津条约》修约期近，急欲遣使出洋通融，却苦于无合适之人。恰此时蒲安臣卸任准备回国，当他得知清政府的苦恼后，便毛遂自荐愿为清政府再次“排难解纷”。对蒲安臣信任有加的奕訢遂积极向皇帝上请派蒲安臣为代表中国政府出使大臣的奏折，其奏曰：“蒲安臣……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共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sup>[10]</sup>很快，皇帝奏准钦派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颁给钦差关防，前往有约各国。<sup>[11]</sup>

蒲安臣之所以如此主动地毛遂自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得到了国务卿西华德的指示。1865年12月，蒲安臣回华盛顿述职时，西华德要他建议清政府遣使赴美。西氏曰：“本国政府甚愿接待一个与你职位相等的外交代表，……因为中国人民侨居美国、特别是侨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非常众多，他们尤其有遣使来此的必要。”<sup>[12]</sup>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率团从上海启程，4月初，使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在美期间，蒲安臣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热情接待，并与国务卿西华德多次就中美关系“谈判一项条约”。7月28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西华德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约》8条，即史书谓之的《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八款：（1）尊重中国在划给各国的贸易通商口岸及其洋面的主权，美国保证不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及其洋面与别国争战、劫夺，但不能因此条而剥夺美国的

自卫权。(2) 中国于原定贸易章程外, 欲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 皆由中国做主自定章程, 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3) 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立领事, 美国当照各国例予以优待。(4) 两国侨民在对方国度均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欺辱凌虐”、“屈抑苛待”。(5) 两国均不得禁阻人民互相往来、贸易游历、久居入籍。(6) 中美相互给予在对方国度的人民以“相待最优之国”人民的待遇。(7) 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 并设立学堂。(8) 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涉代谋别国内政, 中国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外国帮助时, 美国自愿襄助。<sup>[13]</sup>

《蒲安臣条约》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扫荡、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劳动力大量出国、华侨开始在国外形成的大背景下签订的。正因如此, 该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度侨居、待遇、国籍及生命财产的保护等问题, 是华工大规模出国、华侨保护问题提上清政府议事日程的产物。

## 二 《蒲安臣条约》为美国政府从中国输入廉价劳动力大开了方便之门

《蒲安臣条约》签订后, 美国的中美关系史专家马士先生述评道: “这个条约包括了目前美国政府认为极需用修改 1858 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对美国政府来说, 主要的收获是鼓励中国移民。这点正是加利福尼亚所殷望的, 当时该州的公民们正需要便宜而丰富的劳动力以开发该州的资源。”<sup>[14]</sup> 马士先生说得不错。

1848 年, 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河谷发现了黄金, 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到这年年底, 在美洲、澳洲、西欧等地, 人人都知道: 内华达山脉的河床里, 只要用一个普通的洗脸盆, 就可以从沙里淘出黄金而发财。”<sup>[15]</sup> 喜欢冒险, 渴望发财的欧美人纷纷来此淘金。此前还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 随着“淘金热”的兴起, 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后, 大大小小的新老资本家们马上面临一个共同的严重问题——劳动力极度缺乏。

到哪里去寻找劳动力呢? 资本家的目光首先瞄准了来自欧洲的美国东部白人。然而, 由于加州在远离欧洲及美国东部中心的太平洋沿岸, 无论从欧洲或从美东到此, 在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未修成时, 都艰难异常, 花费巨大。很明显, 从欧洲抑或美东输入劳动力, 对资本家而言, 费用太过高昂。他们把目光转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 中国正有着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 把中国的劳动力输入进来, 将可以满足加州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除了加州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极端渴求外, 还有美国航运业对从中国运载华工入美所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追求。19 世纪 50 年代, 美国航运业正面临“货运非常短缺”的萧条景象。运载华工赴美国开发西部, 使美国船主找到了“意外的运货机会”。这个时期, 香港因赔单出洋, 客运异常兴隆, 由于船只不够用, 致“使业已弃置多年, 被认为不能再装运客货的破旧欧洲船都被人高价抢去”, 经过一番改装整理, 重新载客, 并获利丰厚。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运载华工到美, 一方面解了极需劳动力的加州资本家们的燃眉之急, 为投资采矿业、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家提供了获得利润的保证; 另一方面, 又使美国的航运业走出了萧条的沼泽地, 赚到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也是导致《蒲安臣条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淘金热的兴起, 采矿业的发展, 大量黄金被开采出来, 美国太平洋沿岸, 尤其加州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天然屏障的严重制约: 高耸的内华达山脉、落基山脉、沙漠将加州与当时美国经济中心——大西洋沿岸的美东地区分隔开来。修建一条交通干线, 打通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 把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等州与当时美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部地区连接起来, 就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

1862 年, 联邦国会投票通过决议, 决定修建全长 2800 英里的横贯东西部的大陆铁路。美国政府决定, 铁路由东西两端同时修建。西部的中央太平洋公司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筑路工人严重缺乏。尽管中央公司刊行广告, 欲招募 5 千名工人, 但应募者寥寥。负责人克罗克说: “这时,

我们发觉没有办法雇到足够数目的工人，以便使铁路工程按照必要的速度向前修建。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试用中国工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相信，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华工抱有偏见。……我们试用华人做轻活，认为他们做不了重活。后来，我们逐渐发现他们在那里工作得很好……无论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哪里，都发现他们干得很出色，以至于每当我们发现某项工作任务急迫时，最好是马上让华人去干。今天，假如我手头有一件我急于想尽快完成、定有期限的大工程的话，我一定要用中国人去完成它。”<sup>[16]</sup>

由上述情况可知，美国西部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中国劳工的廉价和吃苦耐劳，促动了《蒲安臣条约》的产生。而条约的签订并生效，一为美国从中国输入廉价劳动力大开了方便之门；二为美国资本家招募雇佣华工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 三 《蒲安臣条约》是中国洋务派适应世界潮流，主动保护华侨的产物

1840年的鸦片战争，堂堂的中华大帝国败在一个小小的、离着中国遥遥万里的英国手里，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深切思考：英国有何绝招？随着思考而来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全面了解学习的历史进程拉开帷幕。最早的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他们是中国知识界睁眼看世界的首倡者和实践者。

继之而来的，是比林则徐、魏源更前进了一步的以徐继畲、刘韵珂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他们也亲自参加了鸦片战争，亲眼目睹了英夷的强大。出于对中华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如饥似渴地探求域外世界，评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致富致强的原因和性质。徐继畲的代表作《瀛环志略》已开始用平视的目光审读海外世界，其主要观点有：（1）全球亚、欧、美、非四大洲人类的古代文明是多元发生的；（2）现实世界仍然是多元的世界，各国自有其宗教信仰、价值标准、风俗习尚，不可能以儒家的绳墨作为世界文化的唯一尺度；（3）西方政教与中国不尽相同，且颇有可观者。公元前13世纪，古希腊就实行过共和制。古罗马也曾不立国王，实行议会制度。当代英、美、法、荷等国设有议会，实行选举制、共和制；（4）欧美发达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是远远超过中国的；（5）中外关系正处在古今一大变局之中，正是那些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发达工商科技的国家，已经或将向中华文明及中华帝国“君临万国”的地位挑战；（6）面对千古变局，中国唯有取法西方，变法自强，引进有用知识，借鉴西方政体，方能在西方的挑战中求得生存与发展。<sup>[17]</sup>

徐氏巨著表现出中国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对外界事务的敏锐感觉，体现出超越天朝疆界的人类意识，与当时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惯常意识大相径庭。故而，该书一出版，犹如在中国思想界扔了一颗原子弹般，振聋发聩，反响强烈。它直接启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崛起的洋务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中西条约的签订，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转折之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批师承徐氏思想的洋务大员的出现。这批握有实权的洋务官员，在清政府的中枢机构中有奕訢、桂良、文祥等满族权贵，在各省的封疆大吏中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沈葆楨等。这一批身居要职的洋务派显要，在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中外交流的增多，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求富求强”的热潮。他们继承了林、魏、徐等先进的中国士大夫“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政治理想，并将理想落到了实处。也正是这批洋务大员，在中国的侨政史上，倡导华民出国，签订涉侨条约，主动保护华侨，促成了中国政府的侨政转变——从反对华民出国，漠视遗弃华侨到倡导华民出国，积极保护华侨。

在保护华侨问题上，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以及后来的薛福成、黄遵宪、伍廷芳等人都是有功之臣。最早呼吁倡导保护华侨的，是出生于广东侨乡，其亲人、族人多有赴外洋谋生的丁日昌。他在1867年的《上曾侯自强变法条陈》及后来的《上总署论小吕宋虐待华工书》、《双街上

总署秘鲁换约事宜书》中，切切呼吁清廷保护华侨，并建议清廷设立专门机构“市舶司”管理赴外洋侨民问题，并派使节“赴各国有华侨处管理华人”。<sup>[18]</sup>史称“洋务理论家”的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严惩在广东沿海一带拐贩华民出国的人贩子，倡议在海外设领护侨，并于1876年在亲友的一片反对声中携《瀛环志略》亲赴海外，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任内将保护华侨视为自己不可推卸之重责。<sup>[19]</sup>而洋务运动的主帅李鸿章，则接受郭嵩焘的推荐，选拔了就读于著名的英国林肯律师学院，“在英学律数年，经英人考验，拔取律师”的华侨之子伍廷芳成为自己的法律助手。以后，在伍廷芳的帮助下，李鸿章在主持一系列外交条约的签订中，总能从法律的角度，注意与缔约国对等地增加护侨条款，保护中国侨民。<sup>[20]</sup>比较有名的有：1873年，在与秘鲁外交代表葛尔西耶的谈判中有理有利有节，签订了保护在秘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迫使秘鲁政府保证，此后将“实力保护”华工，“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sup>[21]</sup>

洋务派在保护海外华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际双边条约中签订保护华侨的条款，利用并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由洋务大员主持签订的护侨条约，重要的有中英法《续定招工章程条约》（1866）、中美《蒲安臣条约》（1868）、中西（班牙）《古巴华工专条》（1873）、《中秘会议专条》（1873）、《中西会定古巴华工专条》（1877）。<sup>[22]</sup>其中最重要的，笔者认为通篇充溢着保护华工之精神的《续定招工章程条约》，以及充溢着两国互相开放、彼此保护侨民之精神的《蒲安臣条约》。

#### 四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生效，表现了中国对以西方民族为主导的国际惯例、国际公法的适应与接纳

中国传统的以乡村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和儒家礼法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的中华文明，是在东亚大陆自成系统，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这种自周秦以来就构筑起来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系统，维系着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繁荣，使之始终处于一种继承与变革均衡的渐进性稳定状态中。从法文化角度看，截止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变化，朝代更迭频仍，但始于周秦、成于两汉的一套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模式及其运作机制并未出现过根本危机。随着大洋彼岸资本主义契约经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中华传统文化和法制文明的弊端就日益显现出来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指出的：“中国，一向是世界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口繁多，且最勤勉。然而，它早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的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sup>[23]</sup>亚当·斯密提出的“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社会经济的阻碍，是中国社会由盛变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毫不留情地把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卷入了世界近代化的进程。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一方面无情摧垮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警醒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促使他们开眼看世界，从时代变迁的高度来审度这场中西文明的冲突和较量，并进而引起他们对西方世界建立于契约基础之上的法制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人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西方人和西洋文明，以往那种视儒家教化外的民族为夷狄蛮貊的自大观念崩溃、坍塌了。尤其在西方公使进驻北京后，西方各国公使、领事以及在华办事、任职的各种人员不断以各种方式向清朝当政者灌输西方近代外交条约、移民自由、侨民保护及国际公法、惯例等等思想、观念。奕訢、李鸿章等洋务要员在有名的英法美等公使们的影响下，渐次突破华夷观念的束缚，开始接受西方的国与国之间须平等交往并以国际间的双边、多边条约、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惯例来约束、规范自己行为的国际交往之准则。《蒲安臣条约》就是中西法文化碰撞、冲突、交流、适应的产物；是中国由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转向主动融入该市

场的标志性界碑。它标志着中国在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终于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接纳以西方民族为主导的游戏规则——国际惯例、国际公法。

总之，虽然《蒲安臣条约》从签订到内容都显示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平等和对等，但必须指出，它仍是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条约，即在表面的平等下面隐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条约签订后，中美双方从条约中能够享受到的权益是完全不平等也不对等的。由于中美是两个经济实力、制度文明相差悬殊的国家，条约所赋予对方的巨大权益与便利，美国可以在中国享受，而中国很难去美国享受。从《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中，美国实质上受益巨大。那么，是不是中国从《蒲安臣条约》中一无所获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也从《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中受益。《蒲安臣条约》方便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少人多地方的人民赴美国谋生，当然利大于弊。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排华风潮中，也正是该条约为在美华人遮挡了许多风雨，在相当程度上既维护了美国华工的权益，也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 [参考文献]

- [1] 斯·尤·阿勃拉莫娃. 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04.
- [2] 瓦特·斯图凡特. 秘鲁华工史（张铠、沈桓译）[M]. 海洋出版社，1985. 120.
- [3]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Z]. 北京：三联书店，1957. 32.
- [4] 同上书，145.
- [5] 吴泽. 华侨史研究论集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84 - 87.
- [6]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Z]. 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4.
- [7] 同上书，242.
- [8] 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 [M].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393 - 404.
- [9]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Z]. 27.
- [11] 赵佳盈. 中国近代外交史 [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 [12] 美国外交档案 [Z]. 1866 年第一卷，487.
- [13]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Z]. 北京：三联书店，1957. 261 - 263.
- [14]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张汇文译）[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15.
- [15] 赛·埃·英里森.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735.
- [16] 杨国标，等. 美国华侨史 [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61.
- [17] 徐继畲. 瀛环志略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8] 邓亦兵. 丁日昌评传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 [19] 刘华. 护侨先驱郭嵩焘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
- [20] 苑书义. 李鸿章传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1]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Z]. 第1辑第3册.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1077.
- [22]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Z]. 北京：三联书店，1957.
- [23] 亚当·斯密. 国富论（上）（郭大力、王亚南合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85.